

第一章

中共昌乐党组织的建立及其在大革命时期

(1921 年 7 月～1927 年 7 月)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昌乐的社会状况

昌乐县，位于山东半岛内陆、潍坊市中部，地处泰沂山脉北麓、渤海平原南部，东邻潍城、坊子区，西靠临朐县、青州市，南界安丘市，北与寿光市接壤。昌乐交通便利，胶济铁路横贯东西，公路四通八达；且物产丰富，煤矿、铜矿具有相当的储藏量；盛产五谷，西瓜、黄烟、棉花为主要经济作物。

19 世纪末，以农为本的昌乐县经济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民除了耕田种地外，有的还从事生活所必需的手工业生产。县内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多为家庭经营，有编织、纺织、土陶、砖瓦、榨油、

卷烟等，绝大部分是自产自销、自给自足、分散经营，工艺比较落后。

1898年3月，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在山东取得了胶济铁路的独占修筑权和沿线矿产资源的开发权。1902年，德国修筑胶济铁路通过昌乐县境。此后，德国人在昌乐、朱刘、尧沟等地开设公司和洋行，倾销德货，掠夺昌乐的经济资源。1904年，德国人在高镇一带开矿挖煤，掌握了昌乐的主要矿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派遣军队强占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宣布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9月，日本侵略军占据昌乐县城，他们大批招收工人，开采煤矿，疯狂掠夺煤炭资源；低价收购黄烟、棉花等农产品，向市场倾销日货。此外，运进大批鸦片、吗啡等毒品，在昌乐车站设立了鸦片馆、吗啡馆，毒害昌乐人民，并且在昌乐车站附近开设了军火商店，向土匪和封建军阀出卖军火。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破坏了昌乐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打乱了农民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

辛亥革命以后，国内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不安。昌乐的军阀政府为了维持反动统治、弥补连年混战造成的财政危机，推行一系列反动政策，并在边下、北岩、北展、马宋等地设立税局向人民群众征收繁重的捐税，致使农

民不堪重负，生活十分痛苦。袁世凯倒台后，昌乐县的社会治安更加混乱。岳国栋、刘苍山、杨吾吾、王洪雁、陈子诚等土匪各霸一方，到处抢劫民财，绑架、杀害无辜，无恶不作，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难。

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昌乐人民多次自发地进行反抗斗争。1915年农历九月九日，在一年一度的隋姑山山会上，当局加收捐税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前来赶会的群众一拥而上，痛打了征收捐税的乡绅于洪君和前来督税的官员。当局惧怕农民的力量，只好作出让步，取消了加收的捐税，群众抗税斗争取得胜利。

1916年6月5日，日本军人和商人在城南五里庄用货物低价换去了益昌油坊的大批铜钱，然后竟蛮不讲理地要用武力将货物夺回，激怒了全村民众。青年农民徐保元率领五里庄和附近吕家庄、萧家庄等村的群众奋起抗击。他们使用红缨枪、大刀、锄头，将10名日本人全部击毙。之后，这十余村庄的700多名农民组成了抗日民团，进行训练，主动迎击并屡屡打退了前来报复的敌人，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同年，昌乐全县遭受虫旱灾害，庄稼歉收，广大农民贫困交加，但是当局不顾农民死活，强迫农民纳粮交捐。8月20日，王家河洼村农民王钦宗因没交捐税被北展税局扣押。消息传开，群众不约而同地集合起来，在王法堂的带领下，举行抗税暴动。他们手持锄头、木棒、大刀、

土炮 ,高喊“打倒官府”“营救王钦宗”的口号 ,向北展街进发 ,救出了被扣押的王钦宗。之后 ,暴动农民与前去镇压的军警进行了长达 3 个月的武装斗争 ,打死官兵 30 余人。

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 ,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 ,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 ,但是不能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

第二节 马列主义在昌乐的传播

1919 年 5 月 4 日 ,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反帝爱国运动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 6 月 ,山东学生联合会的 5 个分队和青州学生联合会的宣传队到昌乐进行反日爱国宣传 ,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昌乐县立高等小学的进步学生也组织起来 ,纷纷深入到学校、乡村集镇巡回讲演 ,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 ,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 ,唤醒了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

朱刘镇都昌村青年学生李华亭 1922 年夏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校期间经常接触《新青年》、《励新》、《向导》等进步书刊 逐步树立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思想。他结识了山东早期共产党组织领导人王尽美和邓恩铭同志。在其影响和带动下 ,李华亭积极投身革命行

列，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北展乡孟家淳于村的孟繁锷于 1921 年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一师。孟繁锷素有爱国情怀，入校后精心研读进步书刊，接受进步思想。孟繁锷与经王尽美介绍入党的潍县籍党员庄龙甲是同班同学，两人志同道合，结为挚友。孟繁锷积极参加了庄龙甲在校内创办的“读书会”、“书刊介绍社”等组织及其革命活动。1925 年“青岛惨案”和“五卅惨案”相继发生，庄龙甲以省立一师的名义联合济南各界人士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游行示威中，孟繁锷始终站在前列，经受了考验，被庄龙甲领导的中共省立一师支部吸收入党。

五图镇东耿安村的刘焕彩 1907 年进入清廷禁卫军服役。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促使他走上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1925 年，他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任骑兵团副团长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外，乔官镇梁家庄的梁德元、梁宗鲁，朱刘镇圈子村的张适，北唐吾乡南张庄村的刘明铎等人，也于同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

昌乐县在外地的一批先进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走上革命道路，为马列主义在昌乐的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从 1925 年起，他们利用各种方式和

途径，向昌乐人民宣传马列主义，播撒革命火种。

1925年至1926年夏，共产党员孟繁锷利用假期回到家乡探亲之机，在亲朋好友间和进步青年农民中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社会情况，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到北展、乔官等地集市上公开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演讲，在当地引起积极反响。他还经常走访梁宗鲁、李华亭、刘明铎等，一起分析时局，探讨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交流进步思想。

李华亭在济南求学期间，经常向家乡的进步青年邮寄《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并利用回乡的机会，与青年农民交流思想，受到群众的欢迎。

刘明铎在西部山区一边组织群众抗击土匪，一边进行革命宣传，被群众视为英雄。

马列主义的传播，使在黑暗中挣扎的穷苦农民看到了希望和前途，逐步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才能改变黑暗的现实，才有出头之日。马列主义的传播，也为昌乐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农民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节 中共尧沟支部的建立

1925年，与昌乐县毗邻的潍县、益都和寿光三县相继

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这些地区又建立了党的县级领导机构，党组织发展很快。

1927年2月，为了加强潍县、益都、寿光三县党组织间的联系，开辟昌乐县党的工作，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奉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委派共产党员傅锡泽和傅乃武到尧沟镇，在西大街十字路口东侧路北开设“济生大药房”，以行医卖药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创建党的组织和党的地下联络点。

尧沟是位于昌乐、益都和寿光三县交界处的重镇，紧靠胶济铁路，其东大街、西大街两个村分别为昌乐和益都管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傅锡泽和傅乃武在尧沟立住脚跟后，首先深入设在尧沟的益都县第二小学，在进步学生中开展工作。当时，正值军阀张宗昌统治山东最黑暗的时期，第二小学的学生大都不满社会现状，渴望追求光明。傅锡泽用反对封建军阀、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和介绍苏联社会情况启发教育青年学生，收到了良好效果。当地土豪劣绅见第二小学的学生进出药房，思想发生转变，感到不安。他们制造“傅锡泽要大闹学堂”的谣言，蛊惑人心。接受革命思想的学生不怕土豪劣绅的恐吓，在深夜散发手抄传单，在街巷墙壁上书写“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军阀战争”等标语，在尧沟一带，引起强烈反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傅锡泽和傅乃武于1927年3月首先在第

二小学的青年学生中，发展郭金祥、郭清光、郭金第、王锡庆四人入党。

接着，傅锡泽又利用医生的合法身份，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在农民、小手工业工人和教师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小楼村的扎纸马手工业工人刘洪元、君子巷的青年农民刘清溪、赵家埠头村的小学教员赵来宾等人入党，壮大了党的力量。

1927年3月底，傅锡泽、傅乃武在“济生大药房”主持召开全体党员会议。会议宣布成立中共尧沟支部，傅锡泽任支部书记，傅乃武任联络宣传员，支部隶属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昌乐县第一个中共党的组织诞生了。

5月初，傅锡泽去潍县城通过牟光义向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汇报工作。为了便于领导和开展活动，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决定把尧沟支部介绍给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傅锡泽随后持介绍信去益都，通过益都县农民运动特派员、团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王元盛与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接上关系。此后，中共尧沟支部隶属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

尧沟党支部成立后，在继续加强革命宣传的同时，把发展党员和扩大组织作为主要工作。郭金祥、郭清光组织益都第二小学的进步学生秘密传阅《共产主义ABC》、《陈独秀文存》等革命书刊，向郭清义、郭金民、郭汉宾、郭金彩、张步国、梁绍孔等讲解共产主义的宗旨，并把他们

介绍给傅锡泽和傅乃武。经过一个多月的教育和培养，他们 6 人同时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刘洪元利用扎纸马的手艺和唱地方戏的特长，积极联系群众，发展东西王村王鸣銮入党；刘清溪以做小买卖和串亲的名义，到寿光安家庄发展了数名积极分子；赵来宾在昌乐的赵家埠头等村团结了一批进步农民。尧沟党支部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还发展了一批青年团员（不少党员也同时成为青年团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尧沟支部。这样，中共尧沟支部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活动范围达到昌、益、寿三县的十几个村子。

1927 年 5 月 傅锡泽去益都圣水村 参加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举办的党团骨干短训班。在为期 10 天的学习中，傅锡泽同中共山东区执委领导同志和寿光、益都、潍县、广饶等县的党团负责同志一起，学习理论，交流经验，收获很大。6 月 共青团山东区执委委员宋跃亭到益都 协同李玉鼎在坡子村召开青州地区各县团的负责人会议，会议传达了团山东区执委的指示，并建立了团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傅锡泽代表尧沟团支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团青州地执委委员，昌乐县团的工作受团青州地执委领导。会后，傅锡泽两次在尧沟“济生大药房”召开党团员会议，传达圣水和坡子会议精神，并介绍了益都县圣水、坡子两地蓬勃的革命气象，使党团员们开阔了眼界，振奋了精神。在这两次会议的推动下，尧沟党支部的

工作搞得更加出色。

第四节 淳于、耿安一带的革命活动

1926年8月孟繁锴于山东省立一师毕业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回到昌乐开展党的工作。他频繁去五图镇东耿安村姑妈家中，与在冯玉祥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家探亲的表兄刘焕彩接触，共同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分析昌乐时局，商讨昌乐中共党组织的创建问题。此时，孟繁锴的同班同学、共产党员庄龙甲，已领导成立了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潍县人民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建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潍县一带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使孟繁锴和刘焕彩受到很大的影响和鼓舞。

为了创建中共党的组织，发展党的事业，孟繁锴勤奋工作，孟家淳于、赵家淳于、尹家淳于、秦家淳于、杨家淳于、庙子官庄、北李家河、王家庄等十余村庄，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赵家淳于赵西林、庙子官庄刘存山、尹家淳于尹志刚等在孟繁锴的影响下，积极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此时，从河南郑州回到家乡的刘焕彩，与孟繁锴紧密配合，在东耿安一带更加深入地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他在亲兄胞弟和进步青年中教唱《国际歌》，讲解“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真谛，介绍苏联十月

革命后新社会情况，辅导其三弟刘焕奎、四弟刘焕斗等人阅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在他的努力下，刘焕奎、刘焕斗和西耿安窑工刘效增、小解召村教员刘慈源等成为积极分子。

在孟繁锸、刘焕彩等共产党员的宣传发动下，淳于、耿安一带的广大穷苦农民开始觉醒，涌现出了一大批党的活动积极分子，为昌乐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章

中共昌乐党组织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 年 8 月 ~ 1937 年 7 月)

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昌乐的形势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山东仍处在奉系军阀的统治下。为了维护其统治，山东督军张宗昌宣布山东独立，一边喊着“努力爱民”“誓死救国”的口号，一边残酷镇压革命。

1928 年 5 月 国民党新军阀北上 打败了张宗昌 取得了对山东的统治地位。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出兵山东，占领了胶济铁路沿线，加紧对山东实行政治和经济侵略。

在昌乐，由于军阀混战，反动政府和剥削阶级横征暴

敛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苦，甚至到了难以生存的境地。1927年秋天，正当庄稼成熟的时候，昌乐境内雨雹成灾，庄稼颗粒未收，军阀政府不仅不赈济灾民，反而乘机高价售粮，大发其财。1928年5月2日，奉系军阀张宗昌的残余刘志陆部经过昌乐，强迫农民缴纳1.25万元军款，并到处抢掠民财。1929年3月，兵匪刘桂棠一万多人由莒县、沂水一带流窜至昌乐县境，驻扎在乔官、北岩、边下等地。另一股兵匪赵文斌部招徕窦宝璋部共同与刘匪作战，刘桂棠兵败西逃。交战期间，双方均就地征粮征款，给人民群众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整个昌乐县社会矛盾尖锐，政治、经济和治安秩序混乱，人民群众怨声载道。

随着国民党在山东军事上的胜利，国民党地方组织迅速发展，各县党部相继建立、改组并先后建立政权。1928年6月，国民党昌乐临时县党部成立，国民党的活动转为公开，开始对昌乐实行统治。国民党地方组织掌握政权之后，很快就将矛头指向共产党，宣布共产党组织“非法”，捕杀共产党员，打击共产党的活动。在此前后，党内有个别投机者经受不住考验，变节投靠国民党。1928年1月，中共青州地执委组织部长杜华梓去上海，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叛党声明，随后被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派回益都，担任国民党益都县党部执行委员。由于杜华梓叛变，中共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遭到破坏，使中共昌乐县尧沟

支部一度失去领导。同年7月，昌乐县共青团员王福旭、张千被国民党逮捕，昌乐县共青团组织遭到破坏。此后，昌乐共产党组织的处境更加困难。

第二节 中共尧沟支部的活动和“济生大药房”

中共尧沟支部成立后，由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重要，受到中共山东省委的重视。省委领导及工作人员经常经过尧沟来往于寿光、益都、潍县等地，省委文件、宣传品和地方党组织的报告等也经常通过这里转送，“济生大药房”实际成为省委与昌乐周围各县党组织联系的一个重要的秘密联络站。同时，“济生大药房”也充分发挥了沟通益都、潍县、寿光三县党团组织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三县党的活动的开展和党组织间的交流。当时，经常来往于“济生大药房”的有益都的李玉鼎、王伯阳、王元盛，寿光的王云生、马保三、李铁梅，潍县的田蜀生、郭大同，广饶的任玉书、赵一萍等。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保证过往同志的安全，尧沟支部将“济生大药房”由西大街十字路口东侧路北迁至较为偏僻的南侧路西。尧沟支部的同志不仅热情地接待过往的每一位同志，而且从经济上给予支援，生活上周到服务，工作上全力配合，受到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高度赞扬。

1927年秋，新建立的团青州地委在尧沟傅锡泽开设

的“济生大药房”召开会议，研究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下如何开展团的活动等问题。到会的有李玉鼎、赵一萍、王元盛、任玉书、傅锡泽等。会议确定以尧沟“济生大药房”为团地委的联络机关。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山东省委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向各地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10月下旬，省委将《“八七”会议决议案》、《山东省委通告》等文件发到昌乐、潍县、寿光、高密、青州等地，要求各地党组织进行讨论并贯彻执行。12月，省委派组织部长丁君羊等同志到昌乐、益都、寿光、潍县等地，进一步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要急速进行武装”的指示。当时，省委组织部长丁君羊、团省委负责人李东明首先来到尧沟，决定在“济生大药房”召开青州地区各县党团负责人会议。考虑安全方面的因素，后来将会议移到尧沟附近的寿光县王府村孟雪园家举行。郭金祥与寿光党员孟赤心负责由尧沟到王府村的联络工作，来自青州、昌乐、潍县的6名与会代表经过尧沟前往王府村参加会议。会议开了两天时间，全面系统地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任务。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济生大药房”地下联络机关的工作，以

增进省、县各级党团组织的联系。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回到“济生大药房”作短暂停留，然后从尧沟车站乘车返回各地。尧沟支部在沟通党内上下之间联系的同时，也经常得到省委以及各地党组织负责同志的指导，因此，党的工作搞得更加出色。

1928年1月，张宗昌为了支付庞大的军政经费开支，提前征完了1929年、1930年度的赋税，又严令征收1931年度的地赋和商业税，致使山东全省民怨沸腾。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抗捐、抗税斗争。省委组织部长丁君羊再次到尧沟布置抗粮、抗捐斗争。

在抗粮、抗捐斗争中，尧沟支部组织党员积极行动，连夜在“济生大药房”印制大批的传单和标语，然后在尧沟镇和附近村庄张贴，大造革命舆论，与反动当局进行斗争。益都县当局派往尧沟的两个督税的官员，见势不妙，被迫撤出尧沟，使其征收1931年赋税的计划破产。尧沟支部领导的“两抗”斗争取得了胜利。

尧沟支部还组织党员开展了对土豪“郭三爷”的斗争。“郭三爷”家有三十多亩（大亩）土地，在青岛设有“同和兴酱园”在尧沟镇设有“兴业钱庄”，平日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是地方上的一霸。尧沟支部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对“郭三爷”的斗争，并连夜行动，将“打倒土豪郭三爷！”的标语贴满了尧沟东西两大街、尧沟火车站，甚至贴到了民团团部门口，沉重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

气焰。

1928年1月，为了贯彻中央“八七”会议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精神，培养军事干部，奉山东省委指示，尧沟党支部派傅锡泽、刘洪元、郭金祥、梁绍孔、郭金第和潍县党员郭大同赴济南报考军阀政府开办的警官学校。6人到达济南时，未赶上考期，郭金第、梁绍孔返回尧沟，傅锡泽等奔走多日，终于与省委取得联系。随后傅锡泽、刘洪元被省委派往淄川大荒地煤矿做工运工作；郭金祥、郭大同经组织安排，留济南做党的地下工作。尧沟党支部的工作暂时由傅乃武负责。

1928年清明节前夕，郭大同在济南被军阀当局逮捕，供出了傅锡泽和傅乃武。4月10日，昌乐反动当局奉济南戒严司令部命令，派人到尧沟捕人。主持尧沟支部和地下联络站工作的傅乃武被捕，尧沟党支部遭破坏。与此同时，傅锡泽遵照省委指示，离开大荒地煤矿回到昌乐县北展村，在由潍县党员王全武开设的药铺工作，担负起中共潍县县委和昌乐党组织（中共昌乐中心区委）的联络工作。

尧沟党支部和地下联络站遭到破坏，但尧沟一带的党员并没有停止斗争。他们寻找党的组织，参加寿光、青州等邻县党组织的活动，继续为党工作。傅乃武被捕后，赵来宾和孟赤心积极组织营救。傅乃武在狱中被关押一个多月，因国民党军队攻打济南，政局突变，被释放出狱。